

文学史料研究·朱洪涛主持

# 鲁迅《王道诗话》“五千一掷未为奢”释证

汤志辉

**摘要：**1932年12月，胡适赴长沙讲演，被认为收受何键五千元程仪。鲁迅与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中讽刺胡适“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这句诗的信息来源问题历来受到研究者关注，但始终悬而未决。查阅民国报纸发现，《社会日报》《涛声》《上海报》这三份报纸报道了胡适收受何键五千元程仪的信息。经考证，报道的作者为曹聚仁与秦瘦鸥，且鲁迅直接关注到了《涛声》上的《恭喜胡适大发财》一文，其他两份报纸也在鲁迅视野之内。至此，《王道诗话》中“五千一掷未为奢”的信息来源问题得以解决，这为新版《鲁迅全集》的修订提供了注脚。另外，鲁迅利用报纸报道不加考证的作文方式，则需辩证看待。

**关键词：**《王道诗话》；鲁迅；胡适；五千元程仪

1932年12月，胡适应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之邀，赴长沙讲学，此后有消息传言胡适此次讲学收受了何键五千元程仪。鲁迅与瞿秋白也在《王道诗话》中讽刺胡适“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sup>①</sup>。《王道诗话》中“五千一掷未为奢”的信息来源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但始终悬而未决，未能找到文献出处。<sup>②</sup>在查阅大量民国报纸后，笔者发现了涉及此问题的三处报道，并考证出报道作者为曹聚仁与秦瘦鸥。据笔者推断，鲁迅写作此诗的信息来源即为这三处报道，至此，这一困扰学界的问题得以解决。下面就此问题释证如下。

## 一、“五千一掷未为奢”事件由来

1933年3月6日出版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王道诗话》，署名“干”，这

① 分别见鲁迅：《王道诗话》，《鲁迅全集》第5卷，第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瞿秋白：《王道诗话》，《瞿秋白文集》第2卷，第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② 参见朱正：《重读〈王道诗话〉》，《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8期；陈漱渝：《因〈王道诗话〉而引起的话旧——以瞿秋白和胡适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3期。

是鲁迅使用的笔名。这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鲁迅的《伪自由书》与瞿秋白的文集,为两人共同创作。除了《王道诗话》外,还有12篇文章也分别收入两人的文集。因为这些文章虽是瞿秋白1933年在上海所作,但是“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做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sup>①</sup>。鲁迅后来将这些文章编入自己的杂文集,可见是认可这些文章的署名权。

《王道诗话》针对胡适,攻击了他的三件事:一是《人权论集》;二是胡适到长沙讲演,收了何键五千元程仪;三是《字林西报》所载胡适的谈话。文章结尾处用了四首诗,其中最后一首有两句为“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这句诗攻击的正是上述第二件事。《王道诗话》里的具体记载是:“鸚鵡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这是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叫做’实验主义。”<sup>②</sup>诗中的“侯门”即何将军门下,也就是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何键。这两句诗涉及的具体事件是,1932年12月胡适到长沙讲演,传言收了何键五千元程仪。

关于1932年胡适的长沙之行,笔者已有专文详细论述,<sup>③</sup>此处只略谈与上述两句诗相关的部分。“好向侯门卖廉耻”中的“好向”有积极主动的意思,似乎胡适去长沙讲学是他喜好向达官贵人献媚,是一种主动“投怀送抱”的行为。那么,胡适长沙之行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有何键这样的“侯门”邀约吗?

1932年11月27日,胡适受武汉大学之约,代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视察该会在武大所设生物、物理、植物、动物各讲座及设备,并举行学术讲演。<sup>④</sup>此次胡适南来,首先在武汉公干,然后顺道来长沙,并非专门赴长沙。即便武汉、长沙两地不远,如果仅是何键的邀请,“爱惜羽翼”的胡适也不可能来长沙,更何况“何键是反对白话文,主张‘复古’‘宗孔’的有名人物,曾在报纸上大骂‘陈独秀胡适辈为洪水猛兽’”<sup>⑤</sup>。两人思想主张水火不容,并且还结过梁子,胡适愿

意来长沙当另有隐情。

陈漱渝先生认为,促成胡适长沙之行的主要原因是与朱经农的友谊。<sup>⑥</sup>换句话说,胡适不来长沙,主要因素是朱经农而不是何键。笔者认为此说有理。朱经农与胡适同为美国教育家杜威的门徒,信奉实验主义,两人在美国留学期间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朱经农此时是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掌管一省文教事业,而老友胡适又是全国知名学者与教育家,影响很大。朱经农借胡适到武汉公干的机会,邀请他到湖南来讲学并见上一面,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从1932年11月28日朱经农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真相:

适之兄:

弟近赴湖南各县视察学校,昨晚始归。兄所寄快信今晨方得拜读。兄既到鄂,无论如何必须拨冗来湘一行。兹托刘廷芳兄亲至汉口奉迓,务恳同来向湖南青年讲演几次,不胜感盼。由汉至湘,一夜可达,夕发朝至,与往返宁沪间无异,并不多费时间。何芸公以兄来游之意甚(以下脱落数字),亦亟思与兄一见。公事私事均有须与兄商酌者。千万不可“临河返驾”,使弟失望,且失望者不仅弟一人也。余托廷芳兄面陈不赘。

此请

旅安

弟 经农 手上  
十一月二十八日<sup>⑦</sup>

由此信可知,胡适来长沙讲学是应好友朱经农之约,当然何键即信中的何芸公也表示欢迎,“亦亟思与兄一见”。因此胡适去长沙讲学,卖的

①② 鲁迅:《王道诗话》,《鲁迅全集》第5卷,第51-52、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③⑤ 具体可参见汤志辉、李嘉儒:《胡适1932年长沙之行始末考》,《新文学史料》2024年第1期。

④ 参见《胡适昨由平抵汉》,《武汉日报》1932年11月28日。

⑥⑦ 参见陈漱渝:《因〈王道诗话〉而引起的话旧——以瞿秋白和胡适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3期。

是朱经农的面子,并非“好向侯门卖廉耻”。

所谓“卖廉耻”,则是鲁迅与瞿秋白的过苛之词。考察胡适三天内在长沙的行迹与讲演,并无迎合献媚之举。胡适虽也参加了何键的宴请,但这是出于一种交际礼仪,如拒绝似太不近人情。就是鲁迅也难免完全拒绝这类交际,1927年3月29日,鲁迅与孔祥熙同到广州岭南大学讲演,讲演后“同孔容之归,在其寓小坐”<sup>①</sup>。鲁迅讲演完去孔祥熙寓中小坐,如要苛责,这又作何解释。再看胡适在长沙的四场讲演,讲题分别为《宗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我们所应走的路》《中国政治的出路》《我们必认清文化的趋势》。除第一个讲题没留下内容资料外,第二个和第四个讲题的演讲稿在当时就已发表,第三个讲题虽无演讲稿,但演讲内容在胡适日记中有详细记载。从保留下来的资料看,这些演讲保持了胡适一贯的思想主张,并无阿谀奉承之语。如他在日记中记载的《中国政治的出路》内容:

我的大意说:

I. 不可不认清政治的目标(为什么?):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国家”。

II. 不可不认清敌人(要打倒什么?):五鬼:“贫、病、愚、贪、乱”。

III. 这五鬼古已有之,不自今日始:不是帝国主义带来的,也不是胡适、陈独秀提倡出来的。(前四年,鲁滌平、何键曾通电说道德堕落与社会崩溃是胡适与“陈逆独秀”提倡出来的。)<sup>②</sup>

胡适当着何键的面讲这些话,恐不能引起主持者的高兴,可见他并没有捧场的意思,更遑论“卖廉耻”。

诗中“五千一掷未为奢”所指胡适收了何键五千元程仪,则更是没有的事情,这在胡适日记里有明确记录,12月6日,胡适离开长沙,这天的日记有如下记载:

他(何键)把他的著作送了我一大包,又送菊花砚一块,湘绣两幅,湖南笔两支。我都收了;他请所中职员来说,还送我四百

元旅费。我向他面辞;我去告诉他:此次旅费已由各方面购买车票,几乎不费我一分钱,不能再受旅费了。我辞别后,即离去招待所。

……三点半到车站,送行者甚多。招待所中职员仍把旅费送来,我托经农及刘廷芳代辞;后来所中职员说,今天上午特别去兑换天津、上海纸币;我也因为在车站推来推去不像样子,所以终于收下了。

此行翁咏霓君垫了乙百元,我自己带了九十元出门;三次在汉口旅馆,两次是总司令部代付钱的;往长沙的车票是总司令部买的;今天回去的车票是我自己买的;后天北去的车票是我托武汉大学代买的,大概他们不让我出钱。总计还可以余两百多元。<sup>③</sup>

胡适把此行的开支情况及接受的四百元旅费都详细地在日记中记录下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五千一掷”是不存在的,胡适长沙此行收了何键五千元程仪当是谣言。

鲁迅与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中作诗“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的事件来源就是1932年胡适的长沙之行。通过上述分析,胡适并没有像诗中所说“好向侯门”,也没有“卖廉耻”,更未收受“五千一掷”,可见鲁迅与瞿秋白是相信了谣传。因为《王道诗话》影响甚广,胡适背了一辈子收受何键五千元程仪的坏名声。对于这一历史公案,其实胡适日记出版后也就真相大白了,但是有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那就是鲁迅与瞿秋白这句诗的信息来源,他们是听人说的,还是从哪里看到的。下面依据新发现的史料,谈一下这个问题。

## 二、“五千一掷未为奢”事件报道

以往关于“五千一掷未为奢”的相关记述,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第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②③ 胡适:《日记1932年》,《胡适全集》第32卷,第171、178-17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的注释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胡适应何键之邀到长沙讲演《我们应走的路》，据传何送他‘路费’五千元。”<sup>①</sup>到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相应的注释改为：“1932年12月胡适应何键之邀到长沙作《我们应走的路》等讲演，据传胡适日记载，何送他‘路费’四百元。”<sup>②</sup>因2001年《胡适日记全编》已出版，这一事实据胡适日记得以澄清，所以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中将“五千元”改为“四百元”。但是这一消息来源仍是“据传”，注释者并未掌握这一信息的确切来源。

就这一问题，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先生在《重读〈王道诗话〉》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作者就像讲述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一样，没有说出这一说法的来源。《鲁迅全集》在此处设注，只说是“据传何送他‘路费’五千元”。这条“注释”只不过是正文的重复，只有两点不同，一是将文言词语“程仪”换成了白话的“路费”，二是添上“据传”二字，将正文里说得十分确定的改为不十分确定的。至于这“据传”，究竟是据新闻媒体的传播，还是据口耳之间的传言，没有作出说明。假如找到了某一报道作依据，《全集》注释者按说是不会放过的，看来是并没有在某报刊上找到这样的记载。<sup>③</sup>

朱正先生注意到这一谣传的来源问题，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鲁迅全集》的注释者，还是朱正先生都没找到谣传的来源。陈漱渝先生也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五千一掷’的说法从何而来呢？我觉得有两点应该肯定：一、这种说法严重失实。二、但似乎又不是瞿秋白等人的凭空编造。胡适在长沙逗留期间，在长沙参观了一家生产玻璃和磁器的金华公司。该公司开办经费为5300元。胡适对陪同他参观的湖南省教育厅科员柳德海说：‘5300元的开办费，若归官办，还不够一位总办的全年薪俸呢！’‘五千一掷’的说法是否由此以讹传讹，尚需进一步考证。”<sup>④</sup>陈漱渝认为“五千一掷”的说法不是凭

空编造，有可能是金华公司5300元开办费的以讹传讹。但这些也只是猜测，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证实。朱正、陈漱渝在文中都追问了这一信息的来源，但都未给出具体出处，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者仍沿用“据传”，也没有注释信息的来源。可见，这是一个一直受到关注，但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

在查阅大量民国报刊文献后，笔者发现了三则关于胡适收受何键五千元程仪的报道与文章。因为是重要的史料，下面按发表的时间顺序依次转录。第一则以《胡适一言五千元》为题，刊于1932年12月17日的《社会日报》，没有署名。这则报道距胡适结束长沙之行只有十天，是目前发现关于这一事件的最早报道，内容如下：

胡适此次赴湘演讲学术，以颂扬得体，深蒙何主席之嘉奖，设宴招待，备极周到，频（濒）行，复由何主席馈赠程仪五千元，并浏阳麻菌菊花名屏，及湘绣古玩等多种，湘国货馆长刘廷（廷）芳，亦将国货馆中珍品，搜罗盛一楠木巨箱相赠，胡遂一一收纳，满载而归云。<sup>⑤</sup>

这篇报道明确提到了胡适“复由何主席馈赠程仪五千元”，除此之外，还提到了菊花名屏、湘绣古玩与国货珍品，而胡适日记记载的是菊花砚一块、湘绣两幅、湖南笔两枝及旅费四百元，这与报道相差甚远。第二则是一封虚拟的信件，刊于1933年元旦出版的《涛声》第37期，题为《恭喜胡适大发财》，署名“老前辈”，全文如下：

适之博士，

- ① 鲁迅：《王道诗话》，《鲁迅全集》第5卷，第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② 鲁迅：《王道诗话》，《鲁迅全集》第5卷，第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③ 朱正：《重读〈王道诗话〉》，《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8期。
- ④ 陈漱渝：《因〈王道诗话〉而引起的话旧——以瞿秋白和胡适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3期。
- ⑤ 《胡适一言五千元》，《社会日报》1932年12月17日。

恭喜您啦！您老大发财啦！

何大帅，他啦，从前冤枉您老和“陈独秀”一样洪水猛兽，世道人心之大蠹，要正两观之诛啦！这一回，你老老远跑到长沙替世道人心，贴上封皮，保险千年不烂万年不臭；天子圣哲，皇恩浩荡，五千现雪白大洋钱，您老生受啦！

你老的书斋边，还有一二条空缝没有？有两副对子，请你老赏脸挂一挂，一副是“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一副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这是悬旧了的对子，还请您老赏脸啦！

老前辈：李斯，杨雄，刘歆，阮大铖，钱谦益，杨度再拜<sup>①</sup>

这篇书信形式的文章明显是在讽刺胡适，信中还送了胡适两副旧对联，骂胡适无耻，并提到胡适“五千现雪白大洋钱，您老生受啦！”第三则报道刊于1933年1月8日的《上海报》，题为《胡适在湘讲演获五千金纪》，署名“晓兮”，报道全文为：

胡适之博士在过去是高谈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开山祖，又是“反孔教”“反道统”的急先锋。虽是年来大闹开倒车，然而在一般老前辈眼中，仍然是了不得的。湘主席何键正恰巧与胡博士相反，他是“反对白话文”的健将，主张“复古”“宗孔”最力的有名人物，这是谁都知道的。在胡适表示要赴长沙讲演之前，我们想到何大帅曾在报上大骂“陈独秀胡适辈为洪水猛兽”的话，我们便不禁替胡圣人捏了一把汗，以为这“白话大师”真好大胆，居然敢去碰那“卫道将军”的钉子。诘知这不过是我们庸人的多虑，天下事尽有大谬不然的。我们的胡圣人，这次驾临湖南讲学，不唯没有碰到什么钉子，而且大获何主席的赏识，备受文武百官的欢迎。据湖南来客谈，胡博士前次在长沙一共讲演五天，省府，省党部，一师，女师，湖南大学，湘雅学院，都有博士踪迹，讲的

花样，是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渊博又渊博的。听讲的学生民众，都异常踊跃，就是至尊的何主席，高贵的何夫人，公子小姐都联翩出席听讲。因此胡圣人便大高其兴，上自尧舜禹汤文武孔子的哲理，下至“目前中国政治的出路”，旁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大道，都大发拥护并不主打倒的议论。结局何主席异常满意，异常敬佩，殷勤招待，款以盛宴，临圣人之行也，执礼尤恭，敬馈大洋五千，湘绣数匹，作为主席和夫人贽见。圣人亦本却之未免不恭之义，一笑而谢，再拜而受。于是他便拉（拿）了何主席这笔雪白的大洋钱，就权充中华教育文化委员会秘书的路费。胡去湘声言为该会公干，故云，回到汉口，再上南京。在上海的朋友，一听见了这样难得的好消息，都纷纷写信给博士，恭喜他大发洋财，好朋友并为撰一联，以纪此行。联曰：“轻轻摇着三寸舌，整整赚得五千圆”，洵佳话也。<sup>②</sup>

这篇报道是三篇里最详细具体的，对胡适赴湖南讲演的经过、所讲内容，以及受欢迎程度都有很细致的描述。报道中提到了“临圣人之行也，执礼尤恭，敬馈大洋五千，湘绣数匹，作为主席和夫人贽见。圣人亦本却之未免不恭之义，一笑而谢，再拜而受。于是他便拉（拿）了何主席这笔雪白的大洋钱，就权充中华教育文化委员会秘书的路费”，这里讲的是胡适拿了大洋五千充中华教育文化委员会秘书的路费。对这则消息的来源，报道中讲是“据湖南来客谈”，并非凭空捏造，至于这位湖南来客是谁，则没说清楚。

以上三则消息，就是我们目前能掌握的“五千一掷未为奢”信息的来源。那么鲁迅与瞿秋白在写作《王道诗话》的时候，是否就是看到了上述的信息来源，然后写进文章里的呢？还需进一步考证。

① 老前辈：《恭喜胡适大发财》，《涛声》1933年第37期。

② 晓兮：《胡适在湘讲演获五千金纪》，《上海报》1933年1月8日。

### 三、“五千一掷未为奢”信息来源

目前所见“五千一掷未为奢”事件的公开报道皆来自上海的报纸,而写作《王道诗话》的鲁迅与瞿秋白身处上海。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们正是看了上述报道中的信息,并信以为真才写出“五千一掷未为奢”的诗句。那么,首先需要考证的是他们是否会看这三份报纸。

发表第一则消息的《社会日报》1929年11月1日创刊于上海,因开支、人事等方面的原因于两个月后停刊。1930年10月27日《社会日报》复刊,内容分三版,“内版转载小品文字,外版复辟为二,分刊社会消息与政治新闻”。<sup>①</sup>由陈灵犀负责编辑部事宜。复刊后的《社会日报》因符合普通市民的阅读趣味,逐渐成为当时上海有影响力的小报之一。据后来加盟《社会日报》的曹聚仁回忆:“我的朋友陈灵犀兄主编《社会日报》,销数在三万份以上,震动一时。”<sup>②</sup>可见,《社会日报》销路很广,影响颇大,关心社会时政的鲁迅很有可能会阅读这份报纸。

事实上,鲁迅是看《社会日报》的,甚至还订阅过。鲁迅杂文创作的材料有一些是来自各类报刊,因而鲁迅养成了剪报的习惯,将觉得有用的报纸文章、报道与消息剪存、摘取,一部分加以编号分类,书写标题,或加眉语,以便写文章时可以利用。关于鲁迅保存下来的剪报,有研究者称:“无论在北京,还是到了厦门、广州,他都十分注意剪存报刊上的各种‘消息’,尤其是在上海居住的十年,环境险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残酷、猖獗,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复杂尖锐,各色人物在这里都有一番充分的表演。各类报刊的宣传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思想。所以这时期鲁迅剪存的报纸也是大量的,形形色色的。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剪报约有300余份,大约600余条消息。报纸名称五花八门。”<sup>③</sup>在这些统计中,就有上海发行的《社会日报》。在鲁迅亲自编号整理,并写了标题的剪报中就有几则来自《社会日报》,如1931年1月20日出版的《社会日报》中的《惊人的重要新闻:鲁迅被捕》以及5月26日的《鲁迅借助于内山》。<sup>④</sup>由此可见,鲁迅早在1932年12月17日《社会日报》报道《胡适一言五千元》之

前就有关注这份报纸,而且还做过剪报。曹聚仁加盟《社会日报》后,鲁迅还订阅过《社会日报》。在1935年10月29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说:“因为先生信上提过《社会日报》,就定来看看,真是五花八门,文言白话悉具,但有些地方,却比‘大报’活泼,也有些是‘大报’所不能言。”<sup>⑤</sup>在1936年11月5日发表的《“立此存照”(五)》中又说:“《社会日报》久不载《艺人赋事》了,上海《大公报》的《本埠增刊》上,却载起《文人赋事》来。”<sup>⑥</sup>既知《社会日报》久不载《艺人赋事》,说明鲁迅对《社会日报》保持了持续关注,否则对报纸栏目的变动不会如此熟悉了解。鲁迅在个人信件和文章中,还有多处提及《社会日报》。<sup>⑦</sup>这些证据表明,《社会日报》虽是一份小报,但发行量大,影响很广,鲁迅对这份报纸也很熟悉了解,并保持了持续地关注和阅读。那么,报纸上这则关于《胡适一言五千元》的消息,标题就如此劲爆,鲁迅很可能是会注意到的。

发表第二则消息的《涛声》与鲁迅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涛声》1931年8月在上海创刊,为周刊,上海听涛社编,实际主要由曹聚仁负责。1933年2月11日《涛声》发表了鲁迅署名“罗怃”的自由来稿《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后收入《南腔北调集》,改题为《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文中说:“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

① 雄飞:《本报三年来的总报告》,《社会日报纪念专刊》1934年1月20日。

②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回忆录(修订版)浮过了生命海》(上),第3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③④ 参见左瑾:《鲁迅剪报初探》,鲁迅研究室编:《鲁迅藏书研究》,第333-334、35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⑤ 鲁迅:《351029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3卷,第5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⑥ 鲁迅:《“立此存照”(五)》,《鲁迅全集》第6卷,第6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⑦ 鲁迅提到《社会日报》的文章还有《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续记》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第514、5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sup>①</sup>从文中可知，鲁迅常看《涛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读了《骂人与自骂》后，“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于是写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投给《涛声》。查《涛声》，《骂人与自骂》发表于1933年1月21日第2卷第4期，足见鲁迅肯定是阅读了这一期的《涛声》，才能就《骂人与自骂》这篇文章发表议论，并投稿《涛声》。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是，与《骂人与自骂》同期发表的还有陈中凡致涛声社诸君的信与曹聚仁等的回信，总题为《〈涛声〉的宗旨和态度》。其中，陈中凡在信中认为《涛声》“确与一般小报不同。然再考其主旨，察其态度，根本尚(上)没有多大的差别”，然后举出一些事例，“姑就上海的小报来说，我平时很少有机会与他们接触，偶尔在车中见邻座购阅，看其中记载，大半皆是捉风捕影之谈，其目的不外乎造谣中伤，陷人于法网，我实在不明白这类人的思想何以险恶至此？贵报对于此类恶思想，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肃清？然我在《涛声》上也偶尔看到《胡适出山》《胡适大发财》这一派的消息……如果诸君对于胡君思想有什么不满，竟可提出来讨论，何必学一般小报的技(伎)俩呢？”<sup>②</sup>陈中凡毕业于北京大学，并在北大与胡适共事过，对《涛声》登载造谣胡适的消息非常不满，因此写信给《涛声》。在信里陈中凡明确提到了《恭喜胡适大发财》这篇文章，楚狂老人即陈子展的第二封回信还冠以《复信之二——论胡适之》的大标题。既已明确证实鲁迅读过这一期《涛声》，那鲁迅必然也会看到这一组信，对陈中凡信中提到的《恭喜胡适大发财》一文一定是知道的。此时，胡适与鲁迅因思想观念的不同，早已分途而行，但胡适的出处消息鲁迅是有兴趣的。因此，即便鲁迅此前没读过《恭喜胡适大发财》，但在读了陈中凡的信后，再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读，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那么署名“老前辈”的究竟是何人呢？笔者以为就是曹聚仁，理由如下：《涛声》创办之初，稿件基本由曹聚仁一家包办，除了曹聚仁

外，还有他的妻子王春翠、四弟曹艺。据王春翠回忆：“《涛声周刊》名义上由‘涛声社’负责编辑，实际上开头几期都是曹聚仁唱独脚戏，除本名外，还用陈思、挺岫、韩泽等笔名撰文。”<sup>③</sup>查阅《涛声》的出版，实际上在《涛声》前期曹聚仁基本上都会以不同的笔名在同一期上发表多篇文章，这种情况到《涛声》后期因不同作者的加入才有所改观。再看《恭喜胡适大发财》一文是发表在“从何说起”这一栏目下，这一栏目应是《涛声》在1933年新开设的。该栏目下每期发表文章大概三篇左右，并不一定，时多时少，主要是一些时论杂感。与《恭喜胡适大发财》同期刊发在“从何说起”栏目下的还有署名聚仁的两篇，署名陈思的一篇，陈思是曹聚仁的笔名，实际上就是曹聚仁一人所作。接下来的两期“从何说起”栏目下的文章也都是曹聚仁所作，只是用的不同笔名。从“从何说起”栏目前三期的发表情况来看，当是曹聚仁一人包揽，然后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如此看来，“老前辈”的署名就是曹聚仁。以“老前辈”署名在《涛声》上发表的作品只有这一篇，不是曹聚仁的常用笔名，之所以署“老前辈”，是因为这篇文章是以老前辈的语气拟的一封信。曹聚仁也不能确定文中说的胡适收受“五千现雪白大洋钱”的准确性，所以就以信中的“老前辈”作署名，没有用常用的笔名，或也有逃避文责之嫌吧。

刊载第三则报道的《上海报》由匡仲谋创刊于1929年10月1日，王雪尘、秦瘦鸥先后担任编辑，连载了不少名家长篇，如包天笑、海上漱石生、秦瘦鸥、程小青等，郑振铎、沈从文亦有作品在上面刊载，可见这份小报很重视文艺。鲁迅对《上海报》也是关注的，在他的剪报中就保存有1930年10月3日出版的《言论自由？(下)》、10月8日出版的《学校当注重国文论》

① 鲁迅：《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4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② 陈中凡：《陈中凡君的来信》，《涛声》1933年第2卷第4期。

③ 王春翠：《我的丈夫曹聚仁》，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第36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追纪郑州飞机劫》、10月10日出版的《尖语》等文章。<sup>①</sup>可见在1933年1月8日《上海报》刊载《胡适在湘讲演获五千金纪》之前,鲁迅就对这一报纸很关注,并做了剪报。“五千一掷未为奢”的信息来源也可能是鲁迅看过这则报道。这则报道的署名“晓兮”,笔者推断很可能是秦瘦鸥。因为这时秦瘦鸥为编辑,据“晓兮”在《上海报》上发表的文章来看,主要与文艺界有关,而且消息很灵通,涉及的作家除了胡适外,还有刘复、洪深、张竞生、郭沫若、冰心、陈独秀、沈雁冰、王独清、田汉、庐隐、朱自清、许钦文、陈望道、巴金、郑振铎,等等。秦瘦鸥既是《上海报》的编辑,又身处文坛,由他来写这些文坛消息比较符合情理。

综上所述,《社会日报》《涛声》《上海报》这三份报纸鲁迅都曾留意,《社会日报》《上海报》,鲁迅做过剪报;《涛声》,则在上面发过文章,还曾订阅,与主编曹聚仁更是交往密切。有直接证据的是鲁迅肯定注意到了《涛声》上发表的《恭喜胡适大发财》一文,而撰写此文的曹聚仁在鲁迅发表《王道诗话》之前即与鲁迅有所交往。因而,笔者倾向于认为鲁迅是通过《涛声》上的《恭喜胡适大发财》一文获得“五千一掷未为奢”的信息来源,也不排除鲁迅同时从其他两份报纸上获得此一信息。凭鲁迅与这三份报纸的关联,又在鲁迅极为关注胡适的时期,这样与胡适有关的劲爆新闻,当是会引起鲁迅注意的。

## 结语

鲁迅与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中所言“五千一掷未为奢”,认为胡适在长沙讲演时收受何键五千元程仪的公案,此前随着胡适日记的公开,事实已经很清楚,胡适并没有收何键五千元程仪。但因这篇文章影响深广长远,胡适一直背着这一坏名声。直到2000年还有当年现场听了胡适讲演的人回忆说:“胡适这次讲演,得到听众的赞许,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送了他一笔巨额程仪。次日,有家小报的标题是‘博士头衔仁五千’可能是信笔标写的。”<sup>②</sup>事实已由胡适的

日记得以澄清,但这一谣传的信息来源却一直不见踪影。鲁迅研究专家朱正、陈漱渝等学者也都曾关注这一问题,但都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信息来源。《鲁迅全集》的注释者也没有注出鲁迅从何处获得这一信息。现在根据以上考证,这一困扰鲁迅研究界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这可为新版《鲁迅全集》就“五千一掷未为奢”的注释提供一则有力的注脚。

鲁迅杂文创作有不少材料取自当时的报刊杂志,包括一些小报,这参照现存的鲁迅剪报与他同期所创作杂文中利用的时政信息,就可见一斑。报纸上的报道有时不一定就是事实真相,尤其是一些小报。鲁迅偶有不加考证事实真相就拿来利用之举,这对打击论敌而言是很痛快,但就事实而论则不免偏颇。这样的事例,除了以上所谈公案外,还有鲁迅多次述及梁实秋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清除他的译作的事情,被称为“清书事件”。<sup>③</sup>这都是鲁迅偏信了报纸报道,将一些不可靠的信息写进文章中,而造成了一些可争辩的地方。鲁迅的文章固然如投枪如匕首,但是如利用一些谣言作为攻击论敌的材料,则需辩证地看待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大学校刊与新文学关系研究”(18CZW040)、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数智教育背景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HNJG-202302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汤志辉,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 ① 参见左瑾:《鲁迅剪报初探》,鲁迅研究室编:《鲁迅藏书研究》,第357-358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② 龚业隆:《胡适演讲妙语连珠》,《世纪》2000年第6期。
- ③ 关于“清书事件”可参考魏斌宏:《梁实秋“清书事件”考辨》,《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7期;商昌宝:《是谁制造了“清书事件”:鲁迅怼梁实秋的起因考》,《关东学刊》2019年第4期。